

張元幹年譜

王兆鵬 著



張元幹年譜

王兆鵬 著

華夏出版社

张元千年谱

王兆鹏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

(湖南路8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50千 印张7.375 印数1—2000册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60-108-9/K·7 定价：2.75元

序

唐圭璋

张元干是南宋前期杰出的爱国词人。靖康之难，金兵围攻汴京，元干投笔从戎，登陴拒敌，浴血奋战。其爱国壮举，可惊天地，泣鬼神！绍兴议和，胡铨上书请斩秦桧，天下翕然轰动，胡铨亦因此得罪，而元干却毅然作词壮其行。正气凛然，千载传颂。其他词作亦多抒愤世嫉邪之气，风格豪迈，自成一家。然其平生事迹，文献载录甚少，《宋史》亦未为之立传，诚为憾事。

兆鹏费时六载，详考宋人别集、史乘笔记、地志金石、谱牒图表，并参时贤之作，勾稽排比，写成此谱。用力甚勤，考证颇精。近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官桂铨同志据新发现的《永泰张氏宗谱》作《词人张元干世系》，辨明元干家世，为自来人所不知，殊属难能可贵！兆鹏及时取资参证，

使年谱更臻完善。

余览兆鹏此谱，创获甚多。元干二十岁以后各年行踪皆基本考实，而对宣和六年元干自闽过杭，沿运河北上行踪，途中与杨时、刘安世等名人胜士交游之经过，靖康元年临阵击贼之豪举，“罪放两午未”之原委，考证更详，实道前人所未道。建炎间，元干南渡避难，与时人唱和甚多，谱中条分缕析，逐一考清。又为其作品系年，并有辑佚。此不仅对了解、研究元干词风之演变大有助益，且可为治南宋诗词者参证，于宋代词学研究大有贡献。

昔夏承焘先生著《唐宋词人年谱》，实开近人撰写词人年谱之先例，对推进当代词学之研究，厥功甚伟。今南京出版社为宏扬我中华学术文化，出版兆鹏此谱，实令人欣佩之至！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前 言

张元干，字仲宗，号芦川居士，又号真隐山人，福州永福（今永泰县）人，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享年七十一岁。

张元干一生经历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承平时期的游学与仕宦（35岁以前）。元干早岁丧母，长年随父宦游南北。十余岁，即可与父执唱和，“莫不骇其敏悟”。及冠之年，为在创作上充实、提高自己，元干到江西南昌从大诗人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学习作诗“句法”，与舅父向子谨、深受苏轼爱重的苏坚、苏庠父子，及当时诗名颇著的洪刍、洪炎、吕本中等结社唱和。他们在一起把酒论文、登高赋诗，甚为得意。自此元干创作能力日进，所谓“年少日，如虹豪气，吐凤词华”（《芦川归来集》卷五〔宝鼎现〕，下凡引本集，只注卷数篇名），颇为自负。游学江西后，张元干入太学为上舍生，“在庠序间有声籍甚”。不久，即释褐入仕，任职澶渊。此后曾得小官，押载归闽；宣和末为陈留县丞。南渡前，元干虽官职卑微，但年少气盛，不为介意。久居京城，谙尽“升平”时期的欢乐，过着贵公子“歌笑迷著”的“疏狂”生活：“少年百万呼卢，拥越女吴姬共掷。”（卷六〔柳梢青〕）其间又多次回故乡闽中，沿途得以遍游大江南北的山水风光，拓展了他的艺术视

野，又广交天下名士，“儒门老尊宿”陈瓘、杨时等皆揄扬奖掖，获得颇高的社会声誉。

青年时代，张元干便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透过社会表面的歌舞“升平”，敏锐地看出隐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预感到“天下将乱”。为谋求挽救社会危机的方略，他“阴访命世之贤”。宣和二年（1120）他特地赴江西南康拜谒一代名士陈瓘，与之“商榷古今治乱成败”，研求“王霸术”，常至“夜分乃就寐”。陈瓘为人不仅刚烈正直，在蔡京兄弟炙手可热之际，力论其奸邪，虽百谪而不悔；而且极有政治远见，当时目睹朝政腐败，即预见将有南北分裂之祸（参汪应辰《文定集》卷九《陈忠肃公文集序》）。此次元干与陈瓘畅谈累月，对时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稍后，张元干又到无锡与政治家李纲定交，并商讨治国救民之策，“历论古今成败”。思想上已有天下必乱的隐忧与准备，故当靖康之难发生，他既不象有些士大夫那样茫然不知所措，也不是为全身之计自顾奔命，而是立即“上却敌书”，投笔从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期“速拯涂炭疲氓苏”。

徽宗政和、宣和间，张元干已有词名。不过，由于他尚未经历人生的曲折磨难，生活一帆风顺，词中缺乏深沉的人生感慨，词的境界不出“银烛暖霄，花光照席”（卷七〔望海潮〕）狭窄香软的酒畔花前。艺术上也尚未形成自己的个性，摹拟温庭筠等“花间”词的痕迹比较明显。

二、战乱时期的从军击贼与避难吴越（36—40岁）。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长驱直入，团团围住汴京。其时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持京城抗战，元干参入其幕府，辅佐李纲指挥战斗。围城中，他“登陴拒敌，矢集如猬毛，左

右指麾，不敢爱死，庶几助成公（指李纲——引者）之奇勋，初无爵禄是念也”（祭李纲佚文）。其爱国壮举，诚如唐圭璋师所言“可惊天地，泣鬼神”！惜乎人们至今只知辛弃疾曾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而不知张元干也曾与敌浴血奋战。由于李纲等人（包括张元干）的果断决策及开封军民的殊死作战，终于击退金兵，京师解围。半年后，李纲被投降派排挤出朝，旋因兵败被谪。张元干亦因支持抗战，与之同日遭贬。李纲一去，朝廷只知求和割地，毫不设防备战。年底，金兵再度攻入汴京，俘虏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元干目睹江山毁于误国权奸之手，“愤切吞妖孽”，直欲“一战靖烟尘”，但请缨无路。《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充分表现出其愤激之情：

戎马环京洛，朝廷尚议和。伤心闻徇地，痛恨竞投戈。始望全三镇，谁谋弃两河！甲兵无息日，吾合老江波。

肉食贪谋己，几成国与人。珠旒轻遗敌，玉册忍称臣。四海皆流涕，三军盍奋身？不堪宗社辱，一战靖烟尘！

汴京沦陷后，张元干沿淮河南下避难。建炎间（1127—1130），他飘泊吴越，携家逃难，担惊受怕：“伤弓更心折，四顾皆惊波”（卷一《建炎感事》）；流落异乡，贫困无着：“客里了无况，乱来何止贫”，“泥饮思田父，供粮乏故人”（卷二《冬夜有怀柯田山人》），备尝亡国乱世之苦。更使他心折神伤的还是仕途的再次受挫与理想的破灭。建炎元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建立南宋，首任李纲为宰相。李纲回朝后，起用与他同时遭贬的抗战人士。不久，元干亦

被召用，官将作监，并曾充抚谕使。建炎三年底，元干追随高宗行在至海边，希望有所献纳，施展胸中“谋略”，以“上复九庙仇，下宽四民苦”（卷一《和韵奉酬王原父集福山之什》）。但遭谗受谤，幸友人援救得以免罪。“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的理想彻底破灭。朝中李纲已早被排挤落职，当国的肉食者不思抵抗，只顾逃命避敌，皇帝被敌追迫避难海上，连半壁江山亦未守住。“平生忠义自矢”的张元干对南宋小朝廷失望已甚，“不屑与奸佞同朝”（毛晋《芦川词跋》）；而他又坚持主张抗战，“始终誓复仇，志愿久已确”（卷一《过白彪访沈次律有感十六韵》），也自料难为议和投降的奸佞所容，故待绍兴元年金兵退师，江浙一带道路通畅后，他便“飘然挂冠”。

五年战乱，是张元干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他从繁华竞逐的升平世界跌入黄流乱注、满目疮痍、颠沛流离的境地，生活遭遇、思想情感都发生巨变。山河的沦陷，国家的破亡，理想的失落，生活的贫困，使他欢愉平静的心境变得愤切难平。特别是洞察国家破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王朝内部的腐朽、权奸的议和误国后，他更是“快愤断腰膂”。

思想情感的变化，必定带来审美理想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词作，不再以温庭筠的香软绮丽为宗，而以苏轼的豪迈奔放为尚。满腔勃郁不平之气，吐而为词，音调激越高昂、风格豪迈悲壮；与南渡前的绮艳轻狭判若两人。〔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和〔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是此期的代表作。创作观念也随之变异，创作不再是流连风月，而强调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反对无聊游戏之作。战乱中，张元干曾见一幅《戏犬图》。国家危难之秋，

生民救死不暇，而宗室贵公子却玩弄笔墨游戏，他怒不可遏，挥笔题下一跋：“犬戎乱华，痛愤彻骨，观贵公子墨戏乃尔！使生今代，岂不怒移水中蟹乎！”（卷九《戏犬图宗室景年作》）这虽是就画而言，但要求艺术面对现实，“有补于世”，表现时代的要求、民族的呼声，无疑反映出张元干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态度的转变。南渡后，张元干词多感时伤事之篇，“其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于歌咏”（蔡戡《芦川居士词序》）；其诗歌，尤其是建炎间所作诸诗，斥奸臣，骂叛党，讥朝廷，刺皇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鲜明的时代感，都体现出同一创作观念。

三、苟安时期的隐居与入狱（41岁以后）。绍兴元年（1131）后，江南战火渐息，南宋定都临安。高宗无心收复失地，执议和，以求“临安”做小皇帝。“而大臣专权，以峻刑箝天下口，非曲意阿附，鲜有免者”（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十一《向公墓志铭》）。志士无法实现其恢复中原、一匡天下之志，又不愿同流合污，处小朝廷“忍耻偷生”，故只得退隐林泉，回归到恬静的大自然，以求心灵的超脱自适，保持个体人格的完善。向子理、李弥逊等先后急流勇退、啸傲山水，都反映出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正是在这种朝廷苟安、志士失路的时代氛围中，张元干壮岁挂冠，隐居故乡闽中，与李纲、李弥逊、富直柔等平生好友“登高望远，放浪山巅水涯，未尝不自适而后返”（祭李纲佚文），但生活和心境并不完全宁静，“迨夫酒酣耳热，抚事慷慨，必发虞卿鲁仲连之论，志在忧国”（同上）。绍兴八年，朝廷议和，皇帝公然向金称臣纳贡，天下群情激愤。张元干在裨

州闻之，亦义愤填膺，当即作《再次前韵即事》诗痛斥秦桧之流：“群羊竞语遽如许，欲息兵戈气甚浓”；又作〔贺新郎〕一阕寄李纲，激励他东山再起，重整朝纲，不要再闲居垂钓、袖手旁观。绍兴十二年，胡铨因前此上书反对和议请斩秦桧，又遭诬陷，再贬新州。时秦桧大肆株连，“平生亲党避嫌畏祸，唯恐去之不速”（蔡戡《芦川居士词序》），而张元干却义无反顾，为之伸张正义，作〔贺新郎〕词壮其行，体现出“英雄人”一贯的忠肝义胆。绍兴二十一年，秦桧获知元干送胡铨词，将他追赴临安大理寺，削籍除名。元干入狱时被抄家，其词凡“语及讥刺者悉被搜去”（张广《芦川词序》）。秦桧的淫威并未使六十一岁的张元干屈服。出狱后，元干作〔水调歌头〕《罢秩后漫兴》和同调《追和》，情怀之旷达悲壮，不减当年。至七十岁，豪气不除，所作〔陇头泉〕词仍坚信“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蔡戡谓其词“文词雅健，气格豪迈，有唐人风”。这种风格首先是本源于他主体个性气质的刚正豪迈。

张元干后期词作，主要表现主体复杂矛盾的愤懑心态。他本是英雄壮士，却不得不做山林隐士，因而内心交织着出世与入世、超然物外与世事难忘的矛盾。一方面，他力图忘怀一切，“黄粱梦破，投老此心如水”（卷五〔永遇乐〕），“千古是非浑忘了，有时独坐掀髯笑”（卷五〔蝶恋花〕）；而另一方面，四海横溃，两宫播迁，中原未复，又使他悲愤难平，魂牵梦绕：“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卷五〔水调歌头〕），“西窗一夜萧萧雨，梦绕中原去”（卷六〔虞美人〕）。隐士的旷达胸襟与壮士的悲凉怀抱交融于词，其词便呈现出双重境界和双重风格：既有旷达疏朗者，

又有悲壮豪迈者。前者之如〔水调歌头〕：“吸湖光，吞蟾影，倚天圆。胸中万顷空旷，清夜炯无眠。要识世间闲处，自有樽前深趣，且唱钓鱼船。调鼎他年事，妙手看烹鲜。”主体心胸超脱“空旷”，时空境界涵天纳月、广袤阔大；后者如〔贺新郎〕：“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深沉的历史感慨郁结着报国无门的现实愤懑，吞灭骄虏的气概挟带着故国未复的悲哀。全词气势豪迈，情思悲壮。而冲天之剑气与传恨之琴声相结合，刚柔并用，笔力顿挫。与中期词作相比，张元干后期词增加了一层旷达疏朗的新质。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环境、人生经历、主体心态、情感的变化，张元干的词风也由香软绮丽变为豪迈悲壮再变为旷达疏朗与豪迈悲壮并存。

在两宋词风的转变过程中，张元干词有其独特的地位。北宋末的政、宣词坛，多靡丽之词、狎邪之语，从中看不见创作主体的个性怀抱，也看不到严峻的社会现实。靖康之难，山河沦陷，人民涂炭。张元干率先以词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自我要求抗战复国的壮烈怀抱，奏出了时代最激昂的声响，表现出民族最迫切的心声。其词风格豪迈悲壮，主体个性鲜明，风格与人格一致，实上承苏轼的清雄豪迈，而下启张孝祥词的骏发踔厉和辛弃疾词的淋漓慷慨、悲壮沉郁。

张元干虽以词名世，而其诗也现实性强，充满着炽烈的爱国情感，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富于审美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张元干应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历代文献对他的事迹记载甚少，人们对他人格个性、爱国壮举、诗词成就缺乏完

整具体的了解。我作此谱，是想为深入研究张元干其人其诗（词）做些基础工作，以为知人论世之助。

本谱对张元干的生平事迹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证，基本弄明了他成年后一生的行踪。上文对张元干人生经历、心灵轨迹、创作道路简略的分期描述，就是基于年谱所考。宋南渡之际，作家群体的交游、唱和活动十分频繁密切，本谱花了大量的篇幅考证张元干的交游活动及其交游者的行踪事迹，目的不仅在于对考察张元干在思想、创作上所受时人的影响提供些资料，也希望对了解当时文坛风尚和对研究整个南渡作家群有所助益。凡事迹见于史传的交游者，本谱只稽考其与元干交游的当年行止；事迹鲜见者则予全面考证（然有些因篇幅过大，本谱暂略，将另文刊出）。为研究张元干创作风格的演变，本谱为其作品作了较详的系年，诗文已编年者过半，代表其风格的重要词作亦基本编年。本谱还辑得张元干重要佚文二篇、诗二首，并充分利用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十六卷残本《芦川归来集》，此残本有一卷为今通行本所未收。谱中采录时事，意与张元干诗文及其行踪出处相互参证。本谱尚有不完善和存疑不明之处，幸海内外方家有以教焉。

本谱除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外，还参考了曹济平先生有关张元干研究的系列论文和最近官桂铨先生的《词人张元干世系》。曹先生的文章订正了张元干的籍贯、生卒年，于其生平事迹亦多发现，对我启发甚大。本书在写作和修订过程中，多蒙我的博士生导师唐圭璋先生、曹济平先生和湖北大学曾昭岷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致谢。八十八岁高龄的唐圭璋师不顾年迈体弱，亲自为本书作序，更使我感激不已！

本书得以问世，还要感谢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责任编辑朱起予同志高效率的辛勤劳动，他们提携、扶持青年学子的精神、气魄实令我纫感无既！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唐圭璋
前言.....	(1)
张元干年谱.....	(1)
家世——靖康元年.....	(1)
建炎元年——建炎四年.....	(69)
绍兴元年——绍兴三十一年.....	(104)
附录一 《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	(199)
附录二 引用书目.....	(211)

张元干年谱

张元干，字仲宗，号芦川，又号真隐山人。

芦川之号，始见于十六卷残本《芦川归来集》（下简称残本《归来集》）卷十四《荐拔水陆功德疏》：“芦川老隐绍兴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伏睹永福县……。”复见于通行十卷本《芦川归来集》（下简称本集）卷九《跋山居图》及卷十《甲戌自赞》。真隐山人别号则始见于本集卷九《跋少游帖》。

永福人。

芦川籍贯，历来众说纷纭。其《跋山谷诗稿》自称“闽人张某”（本集卷九）；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四《送张仲宗押戟归闽中》题注：“仲宗，名元干，闽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十一：“《芦川词》一卷，三山张元干撰。”黄升《花庵词选》：“张仲宗，三山人。”宋人皆称其郡望，未明言何县。《四库全书·芦川归来集提要》曰：“周必大跋其送胡铨词，称长乐张元干；睢阳王浚明跋其《幽岩尊祖录》则称永福张仲宗，皆宋人之词，莫详孰是也。”宋以后，或称其永福人，或谓其长乐人，莫衷一是。如清庄仲方《南宋文范·作者考上》和吕留良等《宋诗钞·芦川归来集钞》谓芦川“永福人”，而陆心源《宋史

翼》卷七和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五等则称芦川是“长乐人”，迄今仍存二说。

按：张元干，《宋史》无传，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及清代所修《福州府志》、《乾隆永福县志》亦未著录张元干，故其籍贯前人难以断定。最近福建省永泰县文化馆所发现的明万历十九年重修《永泰张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可澄清历来张元干籍贯异说的疑案。《宗谱》前有乡贡进士陈乐《序》云：“谨按谱讳睦者，固始人，乃其鼻祖。唐昭宗时，从王氏入闽，家于侯官县十都。子三人：庠、膺、贻。庠公仍其旧居，膺、贻避乱居于永福月洲之前后。……膺之曾孙曰仁遇、仁建，永福前张祖也。……仁建有孙曰肩孟者，生五子：曰励、曰勳、曰勣、曰劝、曰动，父子兄弟相继登科，时有‘丹桂五枝芳’之语。五子生孙十二人，并显官于时。惟动之子元干，号芦川居士，其声名尤见重于世。至今州治有堂曰‘昼锦’，坊曰‘棣萼’，皆为其名也。”（谱文引自《文献》1988年第4期官桂铨《词人张元干世系》，下同）按，芦川本集卷十《芦川豫章观音观书》云：“先祖凡五男子，其仕宦者四。”与《宗谱》所载芦川祖父张肩孟有五子相合。《乾隆永福县志》卷二载永福有张肩孟住宅：“张肩孟宅，在半月洲。”此又与《宗谱》谓芦川曾祖张膺避乱居“永福月洲之前后”相合。芦川《豫章观音观书》亦自称：“先祖有旧屋在村落中，子孙不复居，今为佣耕者所舍。”《宗谱》及《淳熙三山志》俱谓张肩孟为永福人，则芦川籍贯为永福（今福建永泰县）可断定无疑。